政治科學論叢／第 90 期／民國 110 年 12 月／頁 35-72

國家的「神話」：
日本遺產制度下「愛努故事認定」的批判政策論述分析*

黃之棟**、朱容萱***

摘　要

2018 年，北海道上川地區的 12 個市町村，共同以「與神共生的上川愛努：傳承於大雪山麓的眾神世界」（カムイと共に生きる上川アイヌ～大雪山のふところに伝承される神々の世界～）爲題，提出「日本遺產」申請，並順利獲得認定。此一認定除意味原住民族文化獲得官方肯認，成爲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標舉了近來日本政府加速推動多元文化的努力。有鑑其重要性，本文擬在「批判政策論述分析」（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論引導下，結合移地研究田野調查成果，來對這宗個案進行分析。對此本文指出，日本遺產制度

* DOI:10.6166/TJPS.202112_(90).0002
本文之性質爲歷時性（longitudinal）研究，從而整個計畫期程橫跨了多個研究專題。其主要田野是在科技部／國科會「臺灣少數族群文化發展的全球治理與在地實踐－（子計畫七）落實原住民族文化權的制度性安排」（NSC 103-2420-H-180-001-MY2）、「日本『諮問機關』制度之研究：以愛努政策爲檢討核心」（MOST 107-2410-H-180-005-MY2）的補助下完成。資料分析與撰寫期間則經過「日本愛努施策推進法之研究：法制規範與政策構造分析」（109-2410-H-180-003）。作者特別感謝兩位審查人的評論與建議。此外，本文相關著作可參考黃之棟（2018）。該文討論愛努政策之整體結構，本文則探討日本遺產制度與愛努的關連。兩篇文章存在一定的連結，還請不吝一併參酌。最後，作者也要特別感謝阿拉巴灣的守護者。

**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E-mail: cthuang@mail.nou.edu.tw。
*** 世新大學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副教授，E-mail: rxchu@mail.shu.edu.tw。

收稿日期：110 年 9 月 7 日；通過日期：110 年 12 月 28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嘗試透過「故事」來串接各式文化資源。此一構思打破了既有以「保存」爲主軸的文化財行政思維，實爲政策上的創新嘗試。但從更爲批判的角度來看，不難發現日本遺產制度其實鑲嵌在國族建構與經濟發展等論述框架之中，致使愛努看似獲得重視，卻依然處於邊緣的位置。有鑑於此，作者指出吾人在歡慶原住民族文化獲得肯認之際，亦需認識到所謂的納入（inclusion），也可能帶著進一步被邊緣化的危險。

關鍵詞：愛努、原住民族、日本遺產、批判政策論述分析、故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緒論：「愛努神話」做為一種「日本遺產」

2015 年，日本文化廳正式公佈了「日本遺產魅力發信推進事業」[1]（以下簡稱「日本遺產」）。這項政策的提出，主要是希望透過創設一項「日本版世界遺產」的制度，來打破既有以「保存」爲主軸的文化財行政框架（青柳正規，2015：133-134）。具體來說，日本遺產制度嘗試透過「故事」（ストーリー），來連接原本「點狀分布」的文化資源，使之串接成一套「故事構成文化財」（ストーリーの構成文化財）。其政策目標，則是希望在 2020 年東京奧運舉辦前，認定出 100 處左右的「日本遺產」。

制度甫一推出，各地便紛紛提出申請。其中，與愛努有關的申請，尤其受到關注。這是因爲，原住民族文化若能獲得認定，相當程度也意味著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愛努同爲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意涵，當然也標示著日本政府有意揮別過去「單一民族國家」的想像，開始朝向「多元共生」邁進。在各方的努力與期盼下，2018 年 5 月北海道 2 個市與 10 個町所共同提出的「與神共生的上川愛努：傳承於大雪山麓的眾神世界」[2] 申請案，正式獲得認定，成爲官方認證的「日本遺產」（上川町役場，2018）。

有鑑於此項認定的重要性，本文擬對之進行分析與討論。爲此，本文首先對全文的分析框架、問題意識、資料來源等背景性資訊進行說明，同時亦對有關文獻進行梳理與回顧。接著，作者轉而對日本遺產制度的創設背景、制度架構進行檢視；隨後，本文亦對上川愛努的申請經過予以耙梳。在此整體的認識下，本文進一步引入移地研究田野資料，嘗試結合理論、文獻、制度、經驗資料，來對愛努文化獲得認定的意義、特徵、爭點等進行分析。至於分析與討論的章節，則試圖在「批判政策論述分析」（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論框架引導下，來對相關議題予以進一步的思考。結論部分，作者則嘗試總結前述分析，並試圖提出可能的啓示做結。

---

1 日文正式名稱爲：日本遺産魅力発信推進事業。

2 日文名稱爲：カムイと共に生きる上川アイヌ～大雪山のふところに伝承される神々の世界～；英文則爲：Kamikawa Ainu in Coexistence with Kamuy ~ Traditional World of the Gods at the Foot of Mt. Daisetsu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貳、分析框架、問題意識與資料來源

一、分析框架：批判政策論述分析

(一) 理論脈絡：政策研究的「論述轉向」(discursive turn)

《批判政策論述分析》(*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一書 (Montessori et al., 2019)，於 2019 年正式出版。自此之後，政策研究的理論，便出現了一套新的分析架構。具體來看，不同於傳統公共行政的政策理解，批判政策論述分析論者將「政策」視爲「論述」及其型構的一環。如此一來，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便取得了一個有效的切入點，爲政策研究的學理、方法以及問題解決，找到新視角與可能 (Mulderrig et al., 2019)。而這股帶有批判 (critical) 思維的構思，也對政策研究帶來了論述的轉向。

事實上，結合論述分析與政策研究的摸索過程，早在 2010 年代左右，便由「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的旗手 Norman Fairclough 開起倡議。對此，Fairclough (2013) 撰文指出，雖然 CDA 與所謂的「批判政策研究」(critical policy studies) 著墨點各異，但兩者嘗試釐清論述建構與實踐過程的初衷，卻存在了論理上的近似。由這點來看，兩者可說是殊途同歸。在 Fairclough 點出當中相近性後，各種嘗試結合兩者的研究也紛紛展開 (Savski, 2018；Wodak & Boukala, 2015)。自此，CDA 的研究方法與核心概念，如「歷史途徑論述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Reisigl & Wodak, 2009)、「辯證關係法」(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Fairclough, 2009)、「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與「互論性」(interdiscursivity) (Fairclough, 1992) 等，也開始被運用在政策分析之中。

整體來看，「批判政策論述分析」認爲，既然政策本身就是論述，那麼不管是政策的產出、執行、還是解釋，整個過程其實都可以被視爲是某種「意義創造的實踐」(meaning-making practice)。既然如此，吾人在進行分析時，也應該把焦點放在論述的產製與型塑，並嘗試揭露論述背後所對應的特定社會價值與權力關係。至於具體的做法，則可透過 CDA 的語言學工具，應用「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 及「語言機制」(linguistic mechanism) 等分析來加以達成 (Jessop, 2004: 160)。如此一來，必能有助於吾人「闡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pret）、「解釋」（explain）政策發展、執行及其被理解的過程（Mulderrig et al., 2019: 3）。

總之，在歷經論述轉向後論者開始意識到，政策不只是某種政府用來解決公共問題的工具而已。政策本身就是論述，且經常被用來進行型構、解釋、轉化、挪移、乃及安置其他論述。這樣的理解，促使論述分析及其工具，大量運用於政策研究之中。

(二) 四大分析特徵

在「批判政策論述分析」的思考下，政策本身就是論述，且經常被用來證成或型構其他論述，以致論述與論述之間，經常呈現出相互關連且層層套疊、相互扣連的狀態。既然如此，在試圖對某項政策進行理解時，便不宜只把焦點放在該政策本身，而必須將之置於更爲宏觀的脈絡之下，來進行總體的觀察。不過，有鑑於這類分析並不容易，批判政策論述論者從而發展出一套分析框架來做爲依循，其中包含四大特徵：「關係（性）」（relational）、「情境特定（性）」（context-specific）、「型構（性）」（constitutive）、以及「權力（性）」（power）（Farrelly et al., 2019: 266）。

首先，「政策實踐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 of policy practices），強調政策的理解與詮釋，需要透過其他政策及論述來進行。正因爲如此，吾人在進行政策論述分析時，不僅要檢視政策內涵本身，亦應探究它們如何爲其他因素所牽動（Farrelly, et al., 2019: 266）。其次，「批判政策論述分析」認爲政策不是從社會眞空中蹦生而成，而是歷史社會情境型塑下的產物。既然如此，各項分析也應置於其歷史社會的語境之中，以便對之進行批判式與「辯證式」（dialectical）的分析（Farrelly et al., 2019: 267）。這種重視情境的思考，即爲「情境特定性」。

至於所謂的「型構」，是認爲政策實踐遠非表面上這般渾然一體。這時研究者必須透過細部檢視，才能釐清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Farrelly et al., 2019: 267）。簡單來說，唯有透過細部的型構檢視，才能揭露政策中隱含的各種既得利益與矛盾緊張，從而梳理當中的衝突與競合（Mulderrig et al., 2009）。最後，「權力性」則強調權力關係的分析。對此，批判政策論述分析論者特別重視少數與弱勢的視角，認爲分析者必須找出論述中對強勢群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資料庫

體有利，但對少數弱勢不利，甚至有害的部分（Farrelly et al., 2019: 268）。具體來說，由於政策或論述經常呈現出包裹式（洋蔥式）的論述群態樣，分析者必須特別留意「論述霸權」（discourse hegemony）的存在。也就是去釐清爲何某些論述特別容易被看見與接納；相反地，爲何某些論述總是受到排擠與輕忽（Caterina, 2019；Montessori, 2019）。對批判政策論述分析而言，少數與弱勢受到的排擠與忽略，尤其需要特別的關注與討論（Bartlett, 2019；Poutanen, 2019）。

綜觀上述，不難發現「批判政策論述分析」的提出，爲政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以下，本文嘗試導入其概念框架，來對「愛努故事認定」之個案進行分析。透過這種理論與實際的交錯，期能對錯綜複雜的公共政策論述提供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二、問題意識：制度性的納入與排除

2015 年日本遺產制度創建當初，作者便意識到此項制度的重要性。其過程，則源自一位愛努懇談會委員（受訪人 B）的提點。當時，這位受訪者提醒筆者，不少表面上標榜「一體適用」的制度，其實隱含了排除的效果。以日本的「傳統工藝品」（伝統的工芸品）制度爲例：

> 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全國就只有北海道無法符合該制度（之規範）。理由很簡單，因爲「傳統」的定義是以 100 年以上爲原則。可是直到最近，北海道都還沒有這麼長的歷史。當然，這些都是從「和人」（大和民族）的歷史來看的。（受訪人 B）

正因爲制度本身就隱含了排除的因子，這也使得愛努傳統工藝品「二風谷盆」與「二風谷織品」（二風谷イタ、二風谷アットゥシ），一直要等到 2013 年才正式獲得官方認定（経済産業省，2021）。

由「傳統工藝品」的案例便可知道，原住民族是否遭到制度性的排除，是觀察原住民族權利進展的一大關鍵。而所謂的納入與排除，也不是表面上這般顯而易見，而需要透過批判的分析，才能使之呈現。在這樣的思考下，愛努文化能否在一項名爲「日本遺產」的制度中獲得認定，也隨即引發作者的關注與長期的追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資料來源

本文爲一歷時性（longitudinal）研究，其整體資料來源有三：一爲訪談資料、二爲移地研究田野調查、三是各種官網、報告書，以及移地研究所得之書面資料。訪談部分基本上圍繞在「愛努法制演進與現狀」的核心關懷周邊。過程中本文一位作者系統地對愛努有識者懇談會、愛努政策推進會議下設之各「推進部會」成員、愛努學者專家等，予以系統的訪談。此部分主要涉及愛努政策的總體構造與政策施爲，可說是架構了本文從事制度性理解時的背景知識。

至於移地研究田野調查的部分，2015 年至今，前述作者實地走訪了多處愛努部落與組織，並進行考察。這些田野地與本研究直接相關者有二，分別爲：2018 年 8 月（大雪山）與 2019 年 10 月（旭川周邊）。期間拜訪了當地族人、愛努團體、公務同仁（觀光課、推動協會）、以及多處愛努場館與文教設施，以便進行調查與資料蒐集（詳附錄）。

除上述資料外，本研究亦分析了政府出版品、報告書、官網等資料。其中，與日本遺產直接相關的網站有二：日本遺產專網（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日本文化廳之日本遺產專網（文化庁文化財部記念物課，2016）；此外，「大雪山麓上川愛努日本遺產推進協議會」[3] 亦設有專網，並提供事業介紹等供下載；至於報告書部分，主要包含「日本遺產」調查研究事業報告書（ランドブレイン株式会社，2015）、[4]「酷日本戰略」（報告書）（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知的財產戰略本部，2019）、「歷史文化基本構想」策定手冊（「歷史文化基本構想」策定ハンドブック）（文化庁，2021a）等。

參、文獻回顧

由於本案涉及「愛努民族」與日本「文化財」政策的交錯，整體而言各項文獻大致也會依其關注視角，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別。具體來看，

3 正式名稱爲：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產推進協議会。

4 日本文化廳委託民間辦理之調查報告。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愛努爲主軸的文獻討論，基本上強調愛努民族如何基於自身主體性來與地域建立連結，並透過各式方案來從事文化復振的工作，以達到族人傳承固有歷史文化的目的。也因爲這樣的關係，文獻中除認定申請單位提出的官方文件之外，專門針對愛努與日本遺產制度的討論，極爲有限（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2018c）。質言之，由於這類文獻的主要關懷，集中在如何運用原住民族的文化遺產。加上相關論者的背景多屬人類學、原住民族研究的關係，故文獻中對於制度的討論也較爲有限，且多止於約略觸及或點到爲止的狀態。

具體來看，髙﨑優子、岡田眞弓（2015）的論文，詳盡比較了北海道與沖繩的案例，並試圖梳理兩地從事原住民族文化遺產活化工作時的差異。該文並以旭川爲例，探索當地嘗試將文化行政與觀光行政相結合的努力。反觀廣野洋、岡田眞弓（2021）的文章，則是以北海道阿寒湖愛努部落的經典案例，透過當地族人的現身說法，來梳理「觀光現場的挑戰」所在。至於大橋美幸（2018）則是進一步透過量化分析，來思索愛努文化建立其「品牌故事」（ブランドストーリー）的可能性。

反觀從文化財行政角度出發的論文，由於論者大都具備政策研究理論或實務的背景，故對日本遺產的制度本身，多有詳盡的分析。但相對的，由於這類文獻的關懷主軸並非原住民族本身，故論者即便提及了上川愛努的個案，基本上也是將之視爲眾多獲得認定的一項案例來看待。質言之，論者的基本看法，是把愛努議題與其他各式的申請等量齊觀，而未將愛努納入日本遺產一事，放在日本政府整體原住民族政策下來進行觀察。

比方說，市川拓也（2017）、柳澤伊佐男（2019）、山下慶洋（2020）等人的論文，都是從政策分析的角度出發，仔細梳理了日本遺產制度創設的背景、過程、審查基準、已知的課題等問題，並對之做出各自的評價。但這些討論基本上專注於制度本身，而未實際觸及個案探究。至於金子淳（2019）的論文，則是仔細回顧了制度與制度間的關連。具體來說，該文梳理了日本的觀光立國政策和日本遺產制度間的關係，並銳利地指出這類透過故事來行銷的政策，所可能引發的問題。不過與前述論文相似，由於關注的焦點是日本遺產制度本身，討論時難免較爲抽象，文中列表雖然提及上川愛努，卻未多所著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過往的研究成果不是把上川愛努的案例視爲愛努政策的一環，就是將之置於日本遺產政策中來討論。對此個案進行專論的探討極爲少見。由這個角度來看，本文透過批判政策論述的研究框架，對於該個案所進行的分析，應可有效填補既有文獻所未觸及的部分。

肆、日本遺產的制度梗概：創設背景與制度意涵

一、制度背景：「鎌倉世界遺產未獲登錄」事件

「日本遺產」制度的擘劃，源自於 2013 年 5 月所發生的「鎌倉世界遺產未獲登錄」問題。當時位於神奈川縣的鎌倉市，結合橫濱市、逗子市，共同提出了「武家的古都・鎌倉」[5] 計畫，申請登錄爲聯合國世界遺產。未料，該案卻得到教科文組織不予登錄的評價（鎌倉市，2013）。由於當時各地申請世界遺產的計畫頗多，落選時應如何處理，便成爲日本政府的一大考驗（日本経済新聞，2013；神奈川新聞，2013）。

爲此，時任官房長官的菅義偉特別召開記者會，宣佈日本政府將創設一套名爲「日本遺產」的制度，來解決相關問題：

> 做爲「酷日本戰略」之一環，對於日本的文化與傳統，由國家來給予背書，並希望在提昇國際知名度的同時，亦成爲世界遺產登錄（工作上）的奧援。[6]（轉引自，柳澤伊佐男，2019）

由此可知，日本遺產制度的創設與世界遺產息息相關。質言之，有鑑於世界遺產的標準相當嚴格，故日本政府嘗試讓有意申請者，先行登錄爲「日本遺產」。如此便得以在國家資源的挹注與輔導下，做好長期的規劃與準備。此外，日本遺產制度亦帶有向世界進行戰略性宣傳（PR）、振興觀光、振興地域等功能。是故，日本遺產制度亦被視爲「文化財版酷日本」計畫

---

5 正式名稱爲：武家の古都・鎌倉。

6 原文爲：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の一環として、日本の文化や伝統に対して国としてお墨付きを与え、国際的な知名度を上げるとともに、世界遺産登録の後押しをしていきたい。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的一環（文部科学省，2015；日本経済新聞，2013；柳澤伊佐男，2019；神奈川新聞，2013）。

二、文化財行政的重構：從「保存」到「活用」

上述基本構想公佈後，日本文化廳亦於 2015 年提出「日本遺產魅力發信推進事業」（文部科学省，2015）。此項制度，亦被納入當時的「日本再興戰略」[7]。對此，日本政府希望：

> 透過地域之歷史魅力與特色，來將我國之文化、傳統予以故事方式呈現。（此項）「日本遺產（Japan heritage）」之認定，截至 2020 年度爲止，將推進至 100 件之程度（本年度共認定 18 件）。此外，（對於）故事訴說時所不可或缺之深具魅力的有形、無形文化遺產群，將以地域爲主體，來予以綜合之整備、活用，並向國內外進行戰略的發信。[8]（首相官邸，2015：177）

簡單來說，日本遺產制度嘗試透過補助的方式，來打破既有的「文化財行政」框架，俾使該國文化財保護法中，[9] 原本國寶、重要文化財、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等不同類型的項目，達到整合。如此便能進一步加以活用，賦予新的意涵。

具體來看，過去日本的文化財行政，主要是透過「指定」的方式，來將不同性質的遺產予以分門別類（如：城郭、寺院、傳統藝能等）的規範，以求能夠妥適保存。在此制度下，各別文化財間所呈現的，是一種「點（狀）」的圖像。此外由於重點放在「保存」，故這些遺產與地域間的關係，亦顯得薄弱（丁野朗，2017；文化庁，2015；文化庁文化財部記念物課，2016；日本遺産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b；市川拓也，2017）。對此，如何以地域爲核心，更有效地對之進行保存與活用，便成爲一大挑戰。

---

7 此一戰略經多次改定，該年度之名稱爲：日本再興戰略改訂 2015－未来への投資・生産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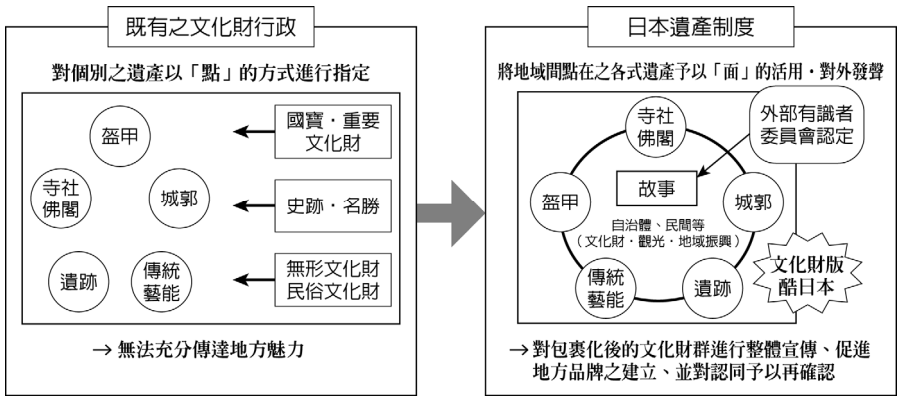
8 全文爲：地域の歴史的魅力や特色を通じて我が国の文化・伝統をストーリーとして現す「日本遺産（Japan Heritage）」の認定を、2020 年度までに 100 件程度行う（本年度は 18 件を認定）。さらに、ストーリーを語る上で不可欠な、魅力ある有形・無形の文化財群を、地域が主体となって総合的に整備・活用し、国内外に戦略的に発信する。

9 正式名稱爲：文化財保護法（昭和 25 年法律第 214 号）。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事實上，日本文化廳 2007 年即開始推動「歷史文化基本構想」政策，嘗試透過「主題」與「故事」，來對遺產進行捕捉（文化庁，2021b）。如此便可將原本散落各地的遺產，以「文化財群」的方式來進行盤點、統整以及串連。也就是把原本「點（狀）」的存在，予以「面」的連結（山下慶洋，2020；文化庁，2015）。

圖 1　日本遺產制度與既有文化財行政之關連



資料來源：參考文部科学省（2015）後繪製

所謂的「日本遺產」，基本上即爲上述概念的深化。也就是透過補助，來把既有之有形、無形文化財予以「故事性」的連結，使之「包裹化」（パッケージ化）。透過故事性的串連，就可以把對外發聲、人才育成、文化傳承、環境整備等措施予以連結，從而使地域活性化成爲可能（日本遺産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b）。也就是說，歷史的經緯與地域的風土，造就了在地獨特的「故事」；這些故事，又反過來串起原本分散各處的文化財，成爲政策的支撐。

再就「活用」來看，其方式也與過去極爲不同。過去活用的手法是以「公開」的方式，透過資料館或參觀設施來讓文化財「能被看見」，從而達到普及啓發的目的。反觀日本遺產制度下的活用，則是將各種文化財視爲某種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又可以用來促成地域的活化（市川拓也，2017；河野まゆ子，2020；柳澤伊佐男，2019）。總之，過去的活用等同於公開，現在則重視使之成爲創造經濟價值的資源。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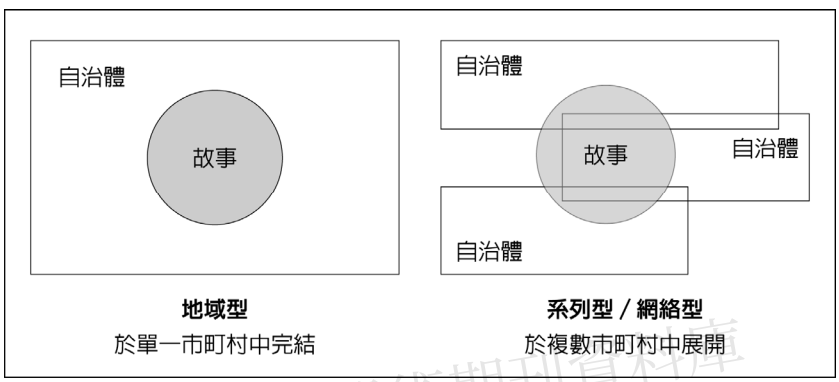
三、日本版世界遺產制度：以「故事」為主軸的文化事業

整體來看，日本遺產制度是以「故事」爲主軸，串起原本點狀分布的各式文化財，使之成爲一套集合性的整體。由於整套制度是以「故事構成文化財」的方式呈現，從而故事的認定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遺產下所稱之「故事」，需具備三大內容。首先，該故事須以歷史的經緯與地域風俗爲根基，並具備跨世代傳承的特徵；其次，整套故事的核心，須設定在能爲當地魅力發聲的主題，圍繞在建造物、遺跡、名勝、祭典等與地域傳承和保存相關的文化財上；最後，這些故事不能只是單純地域歷史或文化財價值的解說。換言之，這些故事必須讓不具專門知識的民眾也能理解；其構成也必須能引發一般人的興趣與關心（山下慶洋，2020；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c）。

至於認定的申請，則分爲兩種：「地域型」以單一市町村（自治體）爲單位，即可完成故事訴說者；「系列型」（亦稱「網絡型」）則是橫跨多個市町村所開展的故事。簡單來說，申請者可以獨自提出，亦可結合周邊若干自治體，一同推出故事，共同提出申請（文化庁文化財部記念物課，2016；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c）。至於構成這些故事的文化財群，則須以當地有形、無形文化財爲對象，且至少須涵蓋一項國家指定或選定之文化財於其中。

圖 2　日本遺產制度的認定模式



資料來源：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政策推動：認定流程、標準與補助項目

再就認定流程來看，日本遺產制度由文化廳推動，並透過各都道府縣之教育委員會，來向全國之市町村進行公開徵件。換言之，日本各地有意申請認定之市町村，需經由都道府縣來向文化廳申請。至於認定的審查，則是由文化廳召集外部有識者，成立「日本遺產審查委員會」來進行審查，並由文化廳最終拍版（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c）。

審查基準部分，主要有三。首先，申請者提出的「故事」，要能凸顯當地特色，亦需充分傳達日本整體魅力。具體的指標共有五項：饒負深意（興味深さ）、嶄新性、訴求力、稀少性、地域性等。審查委員會對這些指標，予以綜合之判斷。其次，申請者必須提出活化資源與地域營造（地域づくり）相關之願景，還必須拿出達成願景的具體策略。最後，整套故事需能向國內外進行戰略且具效果之發聲，並在體制上進行整備，以達成地域活性化（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c）。值得注意的是，審查過程不會對各文化財的個別價值予以審視。換言之，整套制度的重點，終究是放在「故事」之上（柳澤伊佐男，2019）。

由於日本遺產是「地域文化財綜合活用推進事業」項下的措施，因此補助重點也放在地域的自律性活化構築之上。正因爲與地方創生息息相關，具體補助項目也集中在人才育成、普及啓發事業、調查研究事業、情報內容作成事業、活用整備事業等。具體內容包含補助解說員、義工、辦理各項活動、進行調查與資料蒐集、網頁、手冊設計，以及其他硬體設施（道路、柵欄）等的整修。此外，文化廳亦會遴選「日本遺產大使」來進行宣傳，並派遣專業指導員（日本遺產プロデューサー派遣事業）至各地輔導（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a）。截至 2020 年日本遺產制度的認定狀況如下表所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日本遺產歷年申請與獲得認定之狀況

年 度	涉及之都道府縣	申請件數	獲認定之件數	累計認定件數
2015	24	83	18	18
2016	33	67	19	37
2017	40	79	17	54
2018	43	76	13	67
2019	46	72	16	83
2020	47	69	21	104

資料來源：參考文化庁 (2020a；2020b)，文化庁文化資源活用課 (2020) 後，作者製表彙整

伍、認定經過：上川愛努與日本遺產認定

一、愛努原住民族與北海道觀光概說

如眾所知，愛努是世居日本列島北部周邊，北海道、本州北部、以及俄國庫頁島、千島群島附近的原住民族。不管就語言抑或文化來看，愛努與所謂的「和人」（大和民族）皆非常不同。這些獨特的特徵，也使族人長期受到日本政府同化政策的壓抑。即便如此，愛努族人依然持續向各界發聲，希望爭取其做爲原住民族的身分與權益（公益社団法人北海道アイヌ協会，2017）。這樣的努力，直到 2019 年《愛努施策推進法》[10] 通過之後，才獲得實現。該法第 1 條正式承認愛努爲北海道之原住民族。

至於北海道觀光與愛努民族的關連，則可上溯至明治時代。當時北海道的愛努部落（アイヌコタン），已成爲中小學畢業旅行的熱門地點。大正時期之後，由於旅行逐漸成爲日常，旭川與白老等部落也迅速發展爲熱門的觀光景點。爲了向觀光客展示所謂的「愛努文化」，這些地區常由部落長老來扮演「酋長」，身著傳統服飾來與旅客拍照，同時進行祭儀的展示（齋藤玲子，2000）。總之，北海道、大自然、愛努等概念元素及其意象，很早就被放在一起來做爲行銷與推廣。

[10] 該法正式名稱爲：《アイヌの人々の誇りが尊重される社会を実現するための施策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平成 31 年法律第 16 号）。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這種愛努與觀光相互連結的狀況，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明顯。早在昭和 30 至 40 年代（1946～1959）[11] 左右，北海道就經歷了「觀光浪潮」（観光ブーム）。愛努文化更隨著各種觀光振興事業，成爲北海道觀光時不可或缺的元素。其中，舞蹈展演、工藝品展售，特別是以熊爲主題的各式雕刻，更成爲愛努文化、甚至是整個北海道的重要象徵（崔銀姬，2012；廣野洋、岡田眞弓，2021）。

這種將文化與觀光高度連結的現象，一直持續至今。不管是 2020 年開館的「國立愛努民族博物館：UPOPOY（民族共生象徵空間）」，抑或本文所討論的日本遺產，相當程度都試圖將愛努文化與觀光做出某種連結。總之，愛努文化已成爲北海道美食與雄偉地景外的另一種元素（髙﨑優子、岡田眞弓，2015）。

二、獲得認定的故事主軸：上川愛努的衆神傳說

上川盆地位於大雪山麓間，自古即是「上川愛努」的故鄉。上川盆地位於北海道中心地帶，東臨大雪（山）火山群、西有天塩、夕張兩山地、南邊則鄰近富良野盆地，總面積約達 440 平方公里。該區域以旭川爲主要都市。目前旭川人口約有 33 萬人，爲北海道第二大城。市內有石狩川、美瑛川等河流匯流。山河交錯的地形，促使愛努族人臨河而居。由於過去族人多居於神居古潭上游的石狩川流域，故被稱爲「世居上游之人」（ペニ ウン クル；川上に・居る・人）。整個上川盆地，基本上都是愛努族人的傳統領域（イオル）（旭川市，2016；瀨川拓郎，2018）。當地也很早就開始推動愛努政策（新藤慶，2019）。

由於大雪山連峰與石狩川的沖積，上川盆地相當肥沃，草木森林極爲茂密。鮭魚和其他動物，是族人狩獵與魚穫的對象。鮭魚乾（干鮭）更是族人越冬的主要食糧（瀨川拓郎，2018）。過去族人除在河畔建立部落，也建立起繁複的交易體系，同時孕育出當地族人與自然共生的文化與各式傳說。其中，旭川市內及其近郊的神居古潭、嵐山、突哨山、以及魔神的腳

[11] 值得說明的是，此波浪潮具體的時間點，不同學者或有不同的詮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田野過程中不少報導人（如：E、J、L）皆不約而同提及戰後的此波浪潮。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印、魔神的下巴、魔神的身體等處，都有豐厚的愛努傳說流傳當地。[12]

在當地各項傳說裡，又以「神居古潭」（神居部落；カムイコタン）最爲著名。該處是一個激流與奇岩交錯的峽谷，同時也是行舟的要衝，更是過去航運時的險峻之處。這也使得該處自古即被認爲是「魔神」（ニッネカムイ）與「英雄之神」（サマイクル）對戰的場域，十分受到敬畏，也成爲族人向眾神祈禱的聖地（旭川市教育委員會社會教育部，2019）。而這個英雄討伐魔神的傳說，也爲這個「魔神居處之地」孕育出了魔神的腳印、刀痕、下巴、以及最後魔神化身成岩石的「魔神的身體」等故事。除此之外，由於上川愛努認爲「河川是一種逆流而上的生物」（川は山へ遡る生き物）。在這種擬人化的思考下，最上游的大雪山也被認爲鄰近眾神之國。是故，大雪山又被稱爲「眾神遊憩的庭院」（カムイミンタラ；神々遊ぶ庭）（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產推進協議会，2018d；2018e）。

除了神的世界之外，「與神共生的人類生活」（カムイと共に生きる人々の営み）也是故事構成的一大主軸。此部分主要著眼於明治後期，隨著日本政府與和人大舉進入北海道，導致上川愛努的土地大量流失，生活方式也遭到改變，甚至經常面臨強制搬遷的命運。即便生活艱困，愛努族人依然堅持要在自己的聖地，述說自己的傳統，並創造出北海道的象徵物：「木雕熊」（熊的雕刻）。這些都是族人透過各種方式，來向外界發聲的寫照（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產推進協議会，2018c）。

總之，「與神共生的上川愛努：傳承於大雪山麓的眾神世界」的故事申請主軸，結合了當地的自然地景、地貌、動植物生息、愛努傳說、歷史演進、文化展演（舞蹈、雕刻）、教育文化，以及當代族人對於自身的文化傳承等各項要素於其中，並型構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12] 此部分參考了田野時蒐集或在地人提供之日文、英文、中文資料。此類資料多爲單張（面）或爲手冊形式，且多未載明撰寫者、年份等出版資訊，此處不一一列出。

臺灣人類學期刊資料庫

三、認定經過與構成文化財之內容

就具體的認定申請來看，整個推動工作是以上川町爲主責事務局。過程中結合了周邊多個自治體來進行跨地域與跨文化的整合。[13] 由於涉及的自治體眾多，故整個計畫是以「系列型」（網絡型）來進行申請（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產推進協議会，2018c）。

圖 3　上川愛努申請案中各參與自治體之所在地



資料來源：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2018a）

除自治團體之外，申請過程也透過公私協力方式，與當地愛努組織、觀光協會、博物館、工商團體、學者專家等進行整合。整個計畫是希望能在情報發送、觀光、飲食文化、人才育成等不同領域推進。此外，由於涉及地域廣泛，故該計畫也希望透過日本遺產制度，來強化周邊各市町村的交流互動，以便賦予在地歷史新的價值。其構成文化財如下表 2 所示：

[13] 旭川市、富良野市、愛別町、上士幌町、上富良野町、鹿追町、士幌町、新得町、当麻町、東川町、比布町等，共計 2 個市與 10 個町。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表 2 上川愛努申請案或認定之構成文化財列表

類別	文化財名稱	所在地
與神共生：上川愛努	愛努古式舞踊	旭川市
神之里	神居古潭	旭川市
	愛努祈福儀式（カムイノミ）	旭川市
	石狩川	旭川市
上川愛努的聖地：嵐山	嵐山	旭川市
	愛努傳承與地名起源（チカプニ）	旭川市
	愛努儀式（チノミシリ・カムイノミ）	旭川市
	愛努家屋等製作技術傳承	旭川市
衆神遊憩的庭園：大雪山	大雪山、旭岳、層雲峽等	富良野市等 8 個自治體
	高山植物	富良野市等 8 個自治體
	高山蝶	富良野市等 7 個自治體
	愛努舞蹈與祭祀活動（ヌプリコロカムイノミ）	東川町
	愛努送神儀式（フクロウ神事）	上川町
與神共生的人類生活	祭祖儀式	旭川市
	木雕技術	旭川市、上川町
	上川愛努資料（川村カ子トアイヌ記念館）	旭川市
	上川愛努資料（旭川市博物館）	旭川市
	突哨山	比布町
	石垣山	愛別町
	立岩	旭川市
	水龍王神社	旭川市

資料來源：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2018c）

陸、愛努文化獲得日本遺產認定的意義、特徵及其爭點

誠如上述，「批判政策論述分析」強調在進行分析時，有四項分析重點，分別是：關係性、情境特定性、型構性、以及權力性。以下，本文即順此四大分析特徵，來對愛努文化獲得日本遺產制度認定的意義、特點、爭點等議題，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論述之關係性：原住民族的可視化與公共化

首先，關係性討論的主要著眼點，在於認爲政策論述之探討，不宜單獨討論或孤立觀之，而需將之置於更爲宏觀的社會脈絡中來加以檢視。以這個角度來看，如同眾人所知，日本長久以來一直有著「單一民族國家」的想像（佐々木利和，2011；角田猛之，2021a；2021b）。在此論述之下，原住民族的存在與地位究竟爲何，也一直有所爭辯。正因爲如此，納入「日本遺產」與否，也被各界視爲觀察日本能否朝向「多元文化」邁進的指標。對此，不論是族人（報導人 G、M）還是和人（報導人 E、J），都對此次認定抱持高度的肯定與期待。對有族人身分的報導人而言，其意義更是重大。因爲這不但象徵了當地，乃至整個日本多元意識的萌生，族人更希望能藉此喚醒各界對於過去「負面歷史」的重視。

事實上，就更爲深層的意義來看，原住民族文化遺產不單是觀光資源而已，更是一種文化交流的手段。也就是說，論者希望透過觀光來拓展主流社會對愛努文化與歷史的認識。對此，不管是愛努懇談會成員（B）、場館館員（G）、學藝員（E）、學者專家（C）都不約而同提及：考量到愛努人數甚少，故如何增進全體國民的認識與理解，便成爲一大挑戰。在這樣的思考下，若能以觀光作爲突破口，亦不失爲一種新的可能。此即學者所稱之「難被看見遺產的可視化」（見えにくい遺產を可視化する）（高﨑優子、岡田眞弓，2015）。也就是說，原本處於非主流地位的愛努文化，若能得到制度性的認定與肯認，就能因此「被看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愛努文化獲得日本遺產認定，也意味著原住民族的「公共化」。因爲自此之後，愛努就成爲整個日本社會的「共通財／遺產」。

此處可視化與公共化的效果，在日本遺產制度下特別明顯。具體來看，上川愛努申請案的原始發想，就圍繞在愛努生活與文化的周邊，並透過神話故事來串起各構成文化財。這麼一來，整套故事所傳遞的訊息，便不再是對個別「物件」或「事件」的認識，而成爲某種「意義」的傳遞（高﨑優子、岡田眞弓，2015）。對此，曾參與當時策劃的報導人（J）便指出，由於各構成文化財與場所本就存在，且爲在地民眾所熟知。因此企劃時最困難的部分，不在於找出它們，而是要型塑出一套故事以便將之串連起來，並傳達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正確的訊息。也因爲如此，多方討論後才會決定利用日本遺產的經費，設計一套供中學生學習的漫畫教材（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2018b）。而當地的校長（報導人 H），在帶領學生向筆者說明時，也特別強調：如何在鄉土教育中，正確傳達並理解愛努的位置，是當前的主要挑戰。由此可知，日本遺產制度創造了一個機會，促使族人可以將自己所欲傳達的訊息、意義乃至價值，交織於各項展品、展演、乃至教材之中。

二、論述之情境特定性：故事行銷的導入

再就情境特定性的角度來看，不難發現日本遺產事業是一種典型的「故事行銷」（又稱爲：物語觀光、物語消費）。由於區域性故事絕少是憑空創造而來，而是因應該地獨特歷史社會脈絡下而生，是故政策論述可透過在地的故事編撰，來與其他地區做出區隔，從而建立在地品牌，求其「集客」之效果。而日本遺產制度下「故事構成文化財」的設計，就是希望跳脫既有「一件文化財、一項故事」的框架。透過時代背景與分野各異的眾多文化財組合，交織出一套新的故事（丁野朗，2016；2017；古池嘉和，2018）。

質言之，過往的文化財行政，著重個別文化財的優劣性、稀少性。但日本遺產的框架，是以地域爲單位，希望藉由故事的編撰，刻畫出一套屬於在地的新故事。這種以故事爲主軸的推動，除表面上促進觀光的功能之外，另一項重要的意涵，是希望喚起在地居民對自身區域的理解與重視，也就是「地域榮耀」的自覺與促進（丁野朗，2016；2017；古池嘉和，2018）。簡單來說，在地居民在談起當地時，經常會因爲過於熟悉在地的風土與民情，而誤以爲當地「無甚可觀」。一旦故事能被建立，在地資源就能夠獲得盤點，進而予以整合。總之，故事行銷是一套對既有資源重新發覺、盤點、認識、進而重構的過程。

誠如上述，正因爲愛努文化財獲得認定的件數不多，因此過去的文化財行政，明顯不利於愛努族人。不過，由於日本遺產重視的「故事」，不以當地文化財的認定與否或其件數爲主要條件。這樣的制度設計，相當程度便爲上川愛努的認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就如同第一線推動相關工作的報導人（J）的分析：雖然當地已獲認定的文化財不多，但正因爲日本遺產認定時，重視的不是文化財之多寡，而是故事本身的獨特性。北海道獨有

臺灣人學醫研究資料庫

的愛努文化，反而有助於當地獲得認定。

不過反過來看，同位報導人也從實務的角度，說明了故事行銷推動時最大的困難，亦在「故事」之上。簡單來說，以愛努神話爲主軸的故事，其實並不爲大眾，甚至像他這樣一位「和人」推動者所熟知。就其優點來看，對故事的不熟悉一定程度促進了策劃者與族人的連結，因爲過程中需要仰賴族人協助「監修」。但另一方面，策劃過程亦不免感到擔憂，因爲未來潛在的旅客，是以非族人爲主要設定。愛努故事能否引發「和人」甚至是外國旅客的興趣，便成爲一大考驗。不過總體而言，根據幾位愛努場館報導人（E、G、L）的切身觀察，日本遺產的認定，確實有助於提升來館人數。

三、論述之型構性：區域間的緊張與競合

型構面的分析，主要是希望透過細膩的型構檢視，來發現政策下所隱含的矛盾緊張，從而裡解當中內存的衝突與競合。以本案來看，日本遺產制度背後，明顯有著 2020 年東京奧運及日本政府觀光立國的目標於其中（丁野朗，2016；2017）。此點對北海道與愛努社會而言，其實帶有另一層意義。對此，參與推動工作的報導人（J）便直言，當初之所以展開日本遺產的申請，很大原因是因爲東京奧運的到來。根據其內部的調查，北海道整體觀光自昭和年間首波浪潮之後，已明顯下滑。正因爲如此，當地政府與產業一直希望透過東奧，來促使觀光的再次「起爆」。反過來說，在地產業與族人也擔心自己在東奧中「遭到遺忘」。這是因爲，各方在提及「愛努部落」時，白老、阿寒、平取等處，最常浮現腦中；身處北海道中心的上川地區，反而經常遭到遺忘。對此，當地普遍認爲，這種「易被遺忘」的狀況，隨著 2020 年「國立愛努民族博物館」的開幕，只會更加嚴重。

爲此，參與推動工作的報導人（J）也特別分析了各地的競爭態勢。簡單來說，白老有國立愛努民族博物館及民族共生象徵空間，故可說是有國家爲後盾。平取則有著名的二風谷，且曾獲「文化景觀」[14] 的認定。至於阿寒地區，則有阿寒湖、溫泉、世界著名的毬藻（マリモ）、以及北海道最大的愛努部落。從而阿寒也累積了難以撼動的知名度與經驗。相較之下，

[14] 具體名稱爲：アイヌの伝統と近代開拓による沙流川流域の文化的景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川地區給人的印象明顯薄弱。至於其原因，幾位報導人（E、G、M）都不約而同地提及，相較於其他地區沿湖形成部落的特性，上川地區屬沿河而居。這樣的特徵使族人居處較爲分散，亦使當地部落的特徵，不甚鮮明。

總之，從上述的發展態勢，不難感受到上川地區的緊張，擔心會在這波奧運浪潮中遭到遺忘。但也因爲這樣的關係，當文化廳宣布日本遺產的申請計畫時，當地隨即展開了凝聚共識與串連的工作。就某種程度而言，區域間的競爭與緊張，也加速了各項工作的推動。

四、論述之權力性：多重行動者的平衡

再從權力性的角度來分析，不難發現上川愛努的日本遺產認定中亦存在了多重行動者的權力平衡於其中。整體來說，此一制度橫跨中央、地方（都道府縣、市町村）、公、私等不同部門。正因爲涉及多重跨域與協力治理，協調整合的工作也異常複雜。誠如上述，本案是以「系列型」（網絡型）進行申請。這使得整個計畫至少涉及 12 個自治體、3 個愛努組織、各地觀光協會等單位。就其優點來看，由於參與者眾多又打破了既有的行政藩籬與公私部門的疆界，確實起到了促進在地討論的效果。不過，其缺點也顯而易見。正因爲眾多自治體與民間組織參與其中，推動時的「溫度差」及目標設定的歧異，也隨之在所難免（市川拓也，2017；河野まゆ子，2020）。

事實上，誠如熟知計畫推動的報導人（J）所言，即便參與者眾，實際推動終究還是需要主責者（單位）。產生主責者這件事本身，就相當敏感且困難。以本案爲例，報導人（J）便直言，計畫之初原本希望將總部設在主要都市旭川市內。但在多方協調下，最後決定以「振興地方」爲考量，將總部設在上川町。簡單來說，由於各地皆期盼日本遺產成爲經濟的「起爆劑」，故各地一方面必須合作，另一方面亦需競爭。一旦參與者眾多，連帶使得橫縱向的協調也異常困難。

對此，報導人（J）也特別指出，業務推動最困難的部分，其實在於：如何讓大家一起動起來。對此，他生動地指出，大家可能從來沒想過，本次獲得認定的地點多達 20 餘處，地理位置又翻山越嶺，分散各地。就連規劃一套適當的「巴士之旅」，都變得異常困難且難以取捨。不只如此而已，田野過程中筆者也深刻感受到，愛努族人對日本遺產制度的著眼點，亦與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非族人參與者截然不同。因此各自型塑出來的論述，亦極爲不同。對此，從族人的言談即可知道，他們的關懷顯然不在觀光或經濟的「起爆」。更常提及的，反而是對自身文化存續的焦慮，以及盼望主流社會理解與認同的期待。對此，族人報導人（G、M）也特別提及，他們雖然爲自己的文化獲得認定而感到高興，卻依然憂心這些關注可能招來批判。這些都使族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上述總總皆顯示，在一套既有的政策論述下，不同的行動者對政策會有不同的詮釋，特別是本案幅員廣大、地點眾多、利害關係人橫跨公私部門、且涉及原住民族權益等議題時，推動上的困難亦隨之加深，各方權益與考量也隨之難以平衡。尤其需要留意的是，在政府主導的前提下，支配性論述難免壓倒或淡化其他論述，從而愛努的論述也會因此遭致忽略。

柒、分析與討論

一、交互論述下的行銷：被「簡化」與「漂白」的故事

對本文而言，「批判政策論述分析」帶給吾人最大的啓示，在於它強調政策論述的層次性與交互論述性。具體來看，不但政策推動的過程會產製或型塑出一套論述，政策本身亦是論述，且這些論述又經常包裹於其他論述（如：國族建構、經濟發展論述）之中。這種夾雜多樣「類型」（genre）與多重論述的套疊態樣，在上川愛努的日本遺產認定中，尤其鮮明。簡單來看，整套日本遺產的制度是以「故事」爲核心。這樣的框架，促使在地申請者嘗試在既有愛努神話之上，編撰並串接起一套「與神共生的上川愛努」故事。但事實上，整套日本遺產的制度本身，又被鑲嵌在東京奧運、觀光立國、日本再興戰略、多文化共生等多重論述之中。這樣的特徵，導致不少問題。

首先，在進行故事行銷時，整套故事的編成並非基於正確性或客觀性而來，而是在觀光與獲得認定的終極目的下，精心挑選的產物。可以想見，整套故事的編撰須呼應「觀光立國」的政策主軸，也要符合「文化財行政轉向」的基本意旨。換言之，過去「保存優先」政策目標，必須轉換爲以「觀光客爲視角」的「理解促進」，進而將文化財予以「活用」，並最終達至地方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創生與促進經濟的目的。在此整體的政策目標下，簡單易懂成爲優先考量，這也難免導致故事的單純化。問題是，在這個將記憶簡單化的過程裡，「負面的記憶」（負の記憶）以及當中衝突難解的部分，就會遭到刻意淡化乃至排除，而形成「被漂白的記憶」（漂白された記憶）（五味渕典嗣，2018；金子淳，2019）。

這種負面記憶被有意無意排除的問題，在愛努議題上尤爲明顯。實際走訪當地，筆者深切感受到族人雖然企盼自身文化能被正確的認識；但族人其實更希望主流社會能正視愛努「現在、當下」的處遇。問題是，一旦以「愛努神話」爲主軸，隨之挑選的記憶與場域，也必然會往過去收斂。換言之，挑選「神話」的結果，便是問題的「過去化」，從而使人更難看見當前正在發生的「事實」。更直白地說，倘若吾人刻意選定某些不觸及「內部殖民」的故事爲主軸，這時神化與傳說論述的傳遞，反而可能倒過來強化了所謂「傳統愛努生存樣式早已不存在」的認識（小林よしのり、香山リカ，2015；砂澤陣，2019）。

以上多層論述的連結，加上「現實」與「過去」之「愛努故事」的交錯，正是批判論述學者所關注的「互文性」與「互論性」。[15] 對此，「互文性」著名論者 Kristeva (1986: 39) 提醒吾人，必須特別留意這種將「歷史（社會）鑲入文本」（the insertion of history (society) into a text），以及將「文本嵌入歷史」（the insertion of text into history）的交互論述策略。Bakhtin (1986) 更提醒吾人，必須認清論述製造者如何藉由論述來轉變社會歷史資源，以及如何藉由論述來重新突顯某種「類型」（如本案之「神話」）的手法。其它如 Reisigl & Wodak (2009) 或 Fariclough (1992) 都進一步強調，基於論述的開放性與交互混雜（hybrid）的特性，吾人在進行「互論性」分析時，除需探究「類型」與論述間的關聯，亦需關注其衍生出的「次議題」（sub-topics）論述的發展。

具體回到本案來看，正因爲對族人而言，問題並不在於主流社會能否

[15] 這兩個概念爲論述研究常見的表述，互文性是在描述文本（text）與文本間交錯難解的關連，同時強調文本的意義經常由另一文本相互型塑與關連。互論性亦然，是指論述會與另一論述產生關連的狀態。有關互文性與互論性之說明可參見：Reisigl & Wodak (2009: 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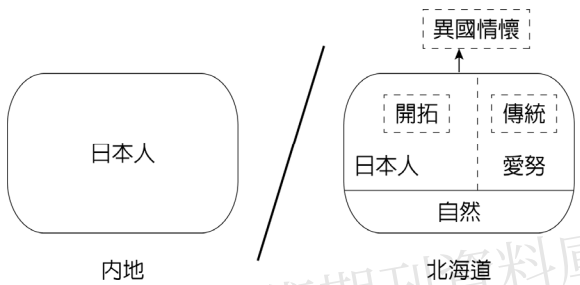
對愛努神話有所認識，而是希望各界對族人實際的生活與困難，能有所體認與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我們選取的「故事」圍繞在神話周邊，而非以族人苦難歷史與現狀爲主軸時，整個愛努議題也難免成爲某種「過去神話」的「次論述」（sub-discourse）。這與當代原住民族運動「過去在此，依然在此」的思考，明顯有著扞格（黃之棟，2017）。

二、觀光資源化下的「他者」：排除、納入及「納入的排除」

同樣的，所謂的故事行銷，也很容易就淪爲某種新型態的「民族展示」（本多俊和、葉月浩林，2007）。民族展示涉及到吾人對「他者」（otherness）與「自身」的認識。這樣的認識可以透過相似與差異的比較，也可透過排除與納入的論述型塑，來建立他者與自身的「界線」（boundary）（Lamont & Molnár, 2002；Wodak, 2012）。事實上，爲了鞏固此種分界，兩方都不斷地透過他者的建構，來形成一種持續論述「他」、「我」的「鏡像」（mirror-imaging）（Borneman, 1992: 17）。

從過去的歷史可以知道，北海道與愛努等議題，都是過往日本國族建構時，日本、日本人自我身分劃定時的重要參照點。也因爲這樣的關係，愛努文化與傳統，長期被視爲一種內國中「異國情懷」（エキゾチシズム；exoticism）再現的場域（渋谷努，2019；鈴江英一，2014）。簡單來說，正因爲有北海道這類的「邊境」（內國殖民地），「內地」才得以確定；同樣的，因爲有愛努等「他者」的存在，「和人」或所謂的「日本人」才能隨之逐步明確化（小熊英二，1995）。

圖 4　北海道與愛努之認識



資料來源：參考渋谷努（2019：260）後繪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這種他者與自我的認識出發，不難發現愛努文化被納入日本遺產，某種程度上確實意味著過去遭到「排除」的少數，獲得被「納入」的機會。但由於這套納入的機制，被鑲嵌在奧運、觀光立國、日本再興戰略等更爲廣泛的框架之下，這也讓愛努族人的參與，亦被嵌入多重跨域治理的網絡之中。這也使得原本的主角，成爲「多元參與者」。更直白地說，愛努族人看似參與了日本遺產的申請，但由於申請的主體是市町村等自治單位，這也使得原住民族只能依附於「地方創生」下，附帶尋求「民族振興」。

更進一步來看，包含國立愛努民族博物館等設施場館在內的各項政策思維，背後都有奧運及「北海道觀光觸媒」（北海道観光の起爆剤に）的思考（產経新聞，2019）。北海道與愛努也隨之成爲日本對外展示其國族建構，特別是邁向多元文化社會宣示的一環。這也使得愛努遭到「觀光資源化」的問題，一直受到各界的批評（吉田邦彥，2021；杉田聡，2019；渋谷努，2019）。質言之，愛努看似在此浪潮之下，從過去的排除而獲得納入；但此處的納入，其實更近似於「納入的排除」。也就是說，原住民族看似納入其中，卻依然處在文化行政、觀光行政的邊陲。只能在各式補助中求取立足點。也因爲這樣的關係，即便被納入日本遺產之中，愛努文化卻依然像是扮演配合演出的從屬。

三、當「聖域」不再神聖：「難被看見之遺產」的依然難見

通過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將原住民族文化、傳說、乃至遺產予以觀光化後的問題。但更爲根本的癥結其實在於，原住民族既然是少數與弱勢的一方，諸如神話、聖地等高度象徵化的場域與景觀，打從一開始其實就難以爲外界（特別是主流社會）所理解。難被理解也導致難被接受，使得原住民族遺產很難獲得認定，從而成爲「難被看見之遺產」（岡田眞弓，2013）。

以上川愛努的構成文化財爲例，獲選之處不乏涉及文化深層的項目。簡單來說，吾人一定得在愛努的文化脈絡下，才能想像大雪山何以是「眾神遊憩的庭園」，以及嵐山爲何是「聖地」。反過來說，如果無法從制度面強化愛努的參與，並使之成爲制度性的主體，則原住民族文化可能終究難以獲得理解。當然，這也會倒過來影響其獲得認定的可能性，從而進一步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

淪爲制度性的陪襯。特別是，看似多元的「日本遺產審查委員會」，並無任何愛努委員。制度性的缺場致使愛努文化稀釋在一百多處的日本遺產之中，使它自始至終都「依然難見」。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政策本身亦是一種特殊的「類型」。它帶著強制或禁止某些社會行動或實踐的企圖，且其背後反應出的是政策制訂者希望注入的特定價值觀（Savski, 2018）。當原本屬於族人精神文化層次的事務被政策塑造成觀光資源時，很大程度就必須爲主流社會所「共有」，甚或不免爲其所「消費」。這時，如何促使族人基於主體地位，來防止過度的觀光化，同時確保原本應有的神聖性，就成爲一大考驗（髙﨑優子、岡田真弓，2015）。這類問題在所謂的「聖域」（具有神聖性的場域）中特別容易發生。再以上川愛努認定一案爲例，本次獲選之處不乏神居古潭等具有特殊文化意涵的神聖場域。一旦成爲觀光景點，就很難確保所有訪客都能尊重其神聖價值。問題是，當聖域不再神聖時，人們即便到了現場，看似見到了原本被主流社會所忽略的「聖域」。但這些場域，事實上還是會因爲大家理解的不足，而「依然難見」。

總之，如何營造出一套妥適的「品牌故事」，使之成爲各方守護愛努文化時的「背景化哲學與歷史」（背景となる哲学や歴史），會是將來的一大挑戰（大橋美幸，2018）。而這也是愛努文化獲得日本遺產認定後艱鉅任務的開始。

捌、結論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日本政府所推動的「日本遺產」制度，嘗試打破過去文化財行政的窠臼，透過「故事」來將既有的文化財資源予以連結，進而達到地方創生、振興觀光、以及向世界進行戰略宣傳的目的。在這樣的構思下，北海道上川地區也以當地獨特的愛努神話爲基底提出申請，並在 2018 年正式獲得認定。整體來說，愛努神話能夠獲得「日本遺產」之認定，相當程度便打破了日本過去單一民族國家的想像。在此同時，此項認定也一定程度擾動了外界與當地看待自我的視角，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透過「批判政策論述分析」的理論視角，來對日本遺產制度下的愛努故事認定進行分析。對吾人而言，批判政策論述分析的啓示，在於它強調政策論述的層次性與交互性。促使吾人意識到，不但政策推動會產製並型塑出論述，政策本身其實亦爲論述。事實上，由於政策、論述之間經常層層包裹與套疊（如：國族建構、經濟發展論述），以致吾人更難看清全貌。由這個角度來審視本案，上川愛努推動日本遺產認定工作的背後，有著地方對東奧的期待，更反映出各地皆擔心自己無法順利搭上此次觀光浪潮的疑懼。其次，正因爲「日本遺產」制度是一種結合文化行政與觀光行政的「成長戰略」，以致愛努文化的保存乃至振興，難免成爲這些政策目標的附隨與配角。從而引發各界認爲日本政府刻意透過「觀光愛努」，來「消費愛努」的質疑。對此，當地族人一方面期待日本遺產的登錄，能夠帶來人潮改善生活，同時深化各界對愛努的認識。但從過去的經驗，卻還是不免擔心唱歌跳舞之後，復振的工作依然遙遙無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遺產制度的提出，確實帶來了文化財行政的政策創新；而愛努文化能夠獲得認定，也確實表徵了日本邁向共生社會的嘗試與決心。但本文也指出，在多重跨域協力治理的框架下，由於整套制度並非以愛努爲主體所創建，反而更容易導致族人越加陷入治理的網絡，而成爲多重參與者中邊緣的一環。這也使得原本由「排除」到「納入」的過程，更像是一種「納入的排除」。認清此一過程，或許也是批判政策論述分析帶給吾人最大的啓示。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黃之棟，2017，〈「NHK 排灣族歧視訴訟」的部落批判理論反思〉，《臺灣民主季刊》，14(1): 95-131。Huang, Morgan Chih-tung. 2017. “「NHK paiwanzu qishi susong」de buluo pipan lilun fansi” [Redeeming De-colonization from Recolonization: A Tribal Crit Analysis of the NHK Defamation Case].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4(1): 95-131.

黃之棟，2018，〈日本愛努原住民族政策及其治理結構〉，《遠景基金會季刊》，19(4): 99-144。Huang, Morgan Chih-tung. 2018. “Japan ainu yuanzhu minzu

臺灣人權學術網 資料庫

zhengce ji qi zhili jiegou" [An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Japan's Ainu/Indigenous Policy]. *Prospect Quarterly* 19(4): 99-131.

二、日文部分

ランドブレイン株式会社，2015,〈「日本遺産」調査研究事業報告書〉，文化庁 web ページ，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zai/nihon_isan/pdf/nihon_isan_hokoku.pdf，2021/12/14。

丁野朗，2016,〈日本遺産の可能性と期待〉，文化遺産の世界 web ページ，https://www. isan-no-sekai.jp/feature/20160401_08，2021/12/14。

丁野朗, 2017,〈文化遺産を活用した地域づくり〉,《調査研究情報誌 ECPR》, 2017(1): 3-8。

上川町役場，2018,〈日本遺産認定『カムイと共に生きる上川アイヌ～大雪山のふところに伝承される神々の世界～』〉, 北海道上川町 web ページ，https://www.town.hokkaido-kamikawa.lg.jp/section/kikakusoumu/d57c9r00000071d4.html，2021/12/14。

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 2018a,〈日本遺産認定ストーリーと文化財〉, カムイと共に生きる上川アイヌ web ページ, https://www.daisetsu-kamikawa-ainu.jp/story/，2021/12/14。

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 2018b,《私のまちの日本遺産「カムイと共に生きる上川アイヌ～大雪山のふところに伝承される神々の世界～」》，上川：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

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2018c,〈事業紹介資料〉，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 web ページ, https://daisetsu-kamikawa-ainu.jp/ja/wp-content/uploads/2019/03/document1.pdf，2021/12/14。

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2018d,〈事業概要パンフレット表面〉，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 web ページ，https://daisetsu-kamikawa-ainu.jp/ja/wp-content/uploads/2019/03/pamph_omote.pdf，2021/12/14。

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2018e,〈事業概要パンフレット裏面〉, 大雪山麓上川アイヌ日本遺産推進協議会 web ページ, https://daisetsu-kamikawa-ainu.jp/ja/wp-content/uploads/2019/03/pamph_ura.pdf，2021/12/14。

大橋美幸，2018,〈ブランドストーリーとしてのアイヌ文化〉,《函館大学論究》，49(2): 77-9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小林よしのり、香山リカ，2015,《対決対談！「アイヌ論争」とヘイトスピーチ》，東京：創出版。

小熊英二，1995,《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山下慶洋, 2020,〈日本遺產：事業開始から 5 年を経過して〉,《立法と調査》, 424: 30-39。

五味渕典嗣，2018,〈対抗的記憶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人間生活文化研究》, 2018(28): 541-548。

公益社団法人北海道アイヌ協会，2017,《アイヌ民族の概説：北海道アイヌ協会活動を含め》，札幌：公益社団法人北海道アイヌ協会。

文化庁，2015,〈「日本遺産（Japan Heritage）」事業について〉，文化庁 web ページ，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img/about/nihon_isan_gaiyo.pdf，2021/12/14。

文化庁，2020a,〈今後の方策について〉，文化庁 web ページ，https://www.bunka.go.jp/koho_hodo_oshirase/hodohappyo/pdf/92737001_23.pdf，2021/12/14。

文化庁，2020b,〈令和 2 年度「日本遺産（Japan Heritage）」の認定結果の発表について〉，文化庁 web ページ，https://www.bunka.go.jp/koho_hodo_oshirase/hodohappyo/92323501.html，2021/12/14。

文化庁，2021a,〈「歴史文化基本構想」策定ハンドブック〉，文化庁 web ページ，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zai/rekishibunka/pdf/handbook.pdf，2021/12/14。

文化庁，2021b,〈「歴史文化基本構想」について〉，文化庁 web ページ，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zai/rekishibunka/index.html，2021/12/14。

文化庁文化財部記念物課，2016,〈「日本遺産（Japan Heritage）」について〉，文化遺產の世 web ページ界，https://www.isan-no-sekai.jp/feature/20160401_01，2021/12/14。

文化庁文化資源活用課，2020,〈特集：日本遺產〉,《文部科学広報》, 244: 1-7。

文部科学省，2015,〈日本遺產魅力発信推進事業〉，文化庁 web ページ，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other/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5/03/16/1355573_09.PDF，2021/12/14。

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a,〈支援策〉，日本遺產ポータルサイト web 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ージ，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about/support.html，2021/12/14。

日本遺産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b，〈日本遺産とは〉，日本遺産ポータルサイト web ページ，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about/index.html，2021/12/14。

日本遺産ポータルサイト，2021c，〈申請にあたって〉，日本遺産ポータルサイト web ページ，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about/application.html，2021/12/14。

日本経済新聞，2013，〈「日本遺産」の創設検討　政府、世界遺産登録へ後押し〉，日本経済新聞 web ページ，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DG1403J_U3A510C1CR8000/，2021/12/14。

古池嘉和，2018，〈物語，観光と文化資本〉，《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篇）》，54(4): 183-189。

市川拓也，2017，〈「日本遺産」で地域活性化！：世界遺産とは異なる，秘めたる “可能性”〉，《大和総研調査季報》，27: 90-105。

本多俊和、葉月浩林，2007，〈アイヌ民族の表象に関する考察：博物館展示を事例に〉，《放送大学研究年報》，24: 57-68。

吉田邦彦，2021，〈世界の趨勢から見た，先住民族の権利保護及び謝罪の理由・意義：民法の観点から（人類学との学際交流を踏まえつつ）〉，《北大法学論集》，72(1): 1-48。

旭川市，2016，〈旭川地域のアイヌの伝統的生活空間の再生に関する基本構想　1 旭川地域のアイヌの人々の生活空間とアイヌ文化〉，旭川市 web ページ，https://www.city.asahikawa.hokkaido.jp/kurashi/329/348/354/p000143.html，2021/12/14。

旭川市教育委員會社會教育部，2019，《旭川愛努族文化信息地圖》，旭川：旭川市教育委員會社會教育部。

佐々木利和，2011，〈ひとつの列島，ふたつの国家，みっつの文化〉，《学術の動向》，16(9): 70-78。

杉田聡，2019，〈アイヌを観光資源化する前に先住権を保障すべきだ：アイヌの自治権が尊重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論座 web ページ，https://webronza.asahi.com/culture/articles/2019042500014.html, 2021/12/14。

角田猛之，2021a，〈グローバル化を手がかりとしたアイヌ政策推進にむけた国内外での活動と成果（I）：中曽根・単一民族国家発言と 1987 年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国連先住民作業部会での北海道ウタリ協会の活動 (2)〉,《関西大学法学論集》, 70(6): 1777-1805。

角田猛之，2021b,〈グローバル化を手がかりとしたアイヌ政策推進にむけた国内外での活動と成果（I）：中曽根・単一民族国家発言と 1987 年の国連先住民作業部会での北海道ウタリ協会の活動 (1)〉,《関西大学法学論集》, 70(5): 1345-1372。

岡田真弓，2013,〈遺跡・遺産が伝える先住民族の歴史と文化〉，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平成 24 年度　遺跡等マネジメント研究集会（第 2 回）報告書》，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 頁 98-107。

河野まゆ子，2020,〈日本遺産を本当のレガシーへ：資源分類しないからこそ輝く地域価値のリアル〉，JTB 総合研究所 web ページ，https://www.tourism.jp/tourism-database/column/2020/12/japan-heritage-regional-value/, 2021/12/14。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2019,〈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知的財産戦略本部 web 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kettei/cj190903.pdf，2021/12/14。

金子淳，2019,〈博物館を取り巻く「物語性」をめぐって：「観光立国」政策と日本遺産を中心に〉,《人文研究》, 11: 80-96。

青柳正規，2015,《文化立国論：日本のソフトパワーの底力》，東京：ちくま新書。

柳澤伊佐男，2019,〈文化財「活用」のすがた①「日本遺産」〉，文化遺産の世界 web ページ, https://www.isan-no-sekai.jp/report/5942, 2021/12/14。

砂澤陣，2019,《北海道が危ない》，東京：扶桑社。

首相官邸，2015,〈平成 27 年 6 月 30 日 日本再興戦略改訂 2015－未来への投資・生産性革命－成長戦略本体〉，首相官邸 web 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dai2_3jp.pdf, 2021/12/14。

神奈川新聞，2013,〈鎌倉世界遺産不登録：文化庁長官「できれば 5 月中にも結論」 / 神奈川〉，神奈川新聞 web ページ，https://www.kanaloco.jp/news/social/entry-115570.html，2021/12/14。

崔銀姫，2012,〈「観光アイヌ」とは何か：まなざしの歴史的な変容をめぐって〉,《社会情報学》, 1(2): 93-108。

新藤慶，2019,〈旭川市のアイヌ政策と行財政〉，小内透（編),《旭川市に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おけるアイヌ民族の現状と地域住民》，札幌：北海道大学アイヌ・先住民研究センター，頁 43-60。

鈴江英一，2014，〈辺境に蓄積するアーカイブズ内国殖民地北海道の文書における国家と地方〉，《アーカイブズ学研究》，20: 74-90。

廣野洋、岡田真弓，2021，〈観光を通してアイヌ文化の継承を目指す：阿寒湖アイヌコタンの挑戦〉，岡田真弓、山村高淑、木村宏、下休場千秋、石黒侑介編（編），《CATS 叢書 Vol. 14》，札幌：北海道大学観光学高等研究センター，頁 107-139。

齋藤玲子，2000，〈現代社会におけるアイヌの工芸の在り方：観光をとおした研究に向けて〉，《昭和女子大学国際文化研究所紀要》，6: 29-42。

鎌倉市，2013，〈「武家の古都・鎌倉」を世界文化遺産に〉，鎌倉市 web ページ，http://www.bukenokoto-kamakura.com/index.html，2021/12/14。

渋谷努，2019，〈札幌オリンピック招致ポスターから見える北海道・アイヌと内地の境界〉，《社会科学研究》，39(2): 255-280。

瀬川拓郎，2018，〈サケとアイヌ〉，《開発こうほう》，657: 14-15。

産経新聞，2019，〈「北海道観光の起爆剤に」　菅氏、アイヌ施設を視察〉，産経新聞 web ページ，https://www.sankei.com/photo/daily/news/190629/dly1906290011-n1.html，2021/12/14。

経済産業省，2021，〈国が指定した伝統的工芸品 236 品目（2021 年 1 月 15 日時点）〉，経済産業省 web ページ，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nichiyo-densan/xlsx/list_20210115.xlsx, 2021/12/14。

髙﨑優子、岡田真弓，2015，〈先住民文化遺産を活かした観光展開を目指すには：北海道と沖縄の事例から考える〉，《開発こうほう》，624: 12-16。

三、西文部分

Bakhtin, M.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rtlett, T. 2019. “Scaling the Incommensurate: Discourses of Sustainability in the Western Isles of Scotland.” In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dvances in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eds. Nicolina Montesano Montessori, Michael Farrelly, & Jane Mulderri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42-265.

Borneman, J. 1992. *Belonging in the Two Berlins: Kin, State, Nation*. New York: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terina, D. 2019.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olicy Analysis Meet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ractical Argumentation: Making Sense of Hegemony Struggles in Italy’s Crisis Management.” In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dvances in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eds. Nicolina Montesano Montessori, Michael Farrelly, & Jane Mulderri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16-241.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 2009. “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In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s.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London: Sage, 162-186.

Fairclough, N. 201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7(2): 177-197.

Farrelly, M., N. M Montessori, & J. Mulderrig. 2019. “Concluding Remarks on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In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dvances in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eds. Nicolina Montesano Montessori, Michael Farrelly, & Jane Mulderri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64-270.

Jessop, B. 2004. “Critical Semiotic Analysis and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2): 159-174.

Kristeva, J. 1986.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Oxford: Blackwell, 34-61.

Lamont, M. & V. Molnár. 2002.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2002): 167-195.

Montessori, N. M. 2019. “Text 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An Analysis of a Struggle for Hegemony in Mexico.” In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dvances in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eds. Nicolina Montesano Montessori, Michael Farrelly,& Jane Mulderri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3-47.

Montessori, N. M., M. Farrelly, & J. Mulderrig, eds. 2019.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dvances in Critical Polic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ulderrig, J., N. M. Montessori, & M. Farrelly. 2019. “Introducing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In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dvances in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eds. Nicolina Montesano Montessori, Michael Farrelly, & Jane Mulderri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22.

Poutanen, M. 2019. “Business Logics: Co-option of Media Discourse by Pro-market Arguments in the Case of Nokia in Finland.” In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dvances in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eds. Nicolina Montesano Montessori, Michael Farrelly, & Jane Mulderri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22-146.

Reisigl, M. &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s.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London: Sage, 87-121.

Savski, K. 2018. "Policy-making: Documents and Law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s. Ruth Wodak & Bernhard Forchner. London: Routledge, 355-367.

Wodak, R. 2012. "Language, Power and Identity." *Language Teaching* 45(2): 215-233.

Wodak, R. & Boukala, S. 2015. "European Identities and the Revival of Nation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Discourse Histor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Language & Politics* 14(1): 87-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訪談暨田野列表[16]

編號	時間	地點	類型	調查方式
A	2015.08.19	札幌	愛努協會成員	訪談
B	2015.08.28	札幌	愛努懇談會成員	訪談
C	2015.08.29	札幌	愛努學者	訪談
D	2018.08.29	大雪山	觀光業者	田野調查
E	2019.10.22	旭川地區	愛努場館學藝員	田野調查
F	2019.10.22	旭川地區	觀光課同仁	田野調查
G	2019.10.23	旭川地區	愛努場館館員	田野調查
H	2019.10.23	旭川地區	校長 （帶領若干位學生）	田野調查
I	2019.10.24	旭川地區	愛努場館館員	田野調查
J	2019.10.24	旭川地區	推動協會同仁	田野調查
K	2019.10.24	旭川地區	愛努場館館員	田野調查
L	2019.10.24	旭川地區	愛努場館館員	田野調查
M	2019.10.24	旭川地區	耆老 （共登聖山）	田野調查

[16] 由於本研究爲歷時性研究的關係，整體跨度較長，各項訪談雖皆與整體愛努政策有關，卻未必直接涉及日本遺產制度。有鑑於此，訪談部分僅列出文中引用或有關之部分。

臺灣人學 電子期刊資料庫

The National "Myth":
A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of "Ainu Story Recognition" under the Japanese Heritage System*

*Chih-tung Huang*** & *Rong-xuan Chu****

Abstract

In 2018, 12 municipalities in the Kamikawa region of Hokkaido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for "Japan Heritage" under the title "Kamikawa Ainu in Coexistence with Kamuy: Traditional World of the Gods at the Foot of Mt. Daisetsu", which was later approved by th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This approval not only means that the Ainu/indigenous culture has b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Japanese culture overall, but it also marks the recent efforts b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to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such a recogn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s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fieldwork data.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Japanese heritage system attempts to link various cultural resources through "stories", which break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mindset of "preservation" as being the main axis of cultural property. This can be deemed to be truly innovative. However, when viewed from a more critical perspective,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Japanese heritage system is embedded in the discourses of nation-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the Ainu's "seemingly valued but still marginal" posi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while we celebrate the recognition/inclus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s, we also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danger of further marginalization that accompanies it.

Keywords: Ainu, Indigenous Peoples, Japanese Heritage System,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Stories

---

* DOI:10.6166/TJPS.202112_(90).0002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E-mail: cthuang@mail.nou.edu.tw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Applied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rxchu@mail.sh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